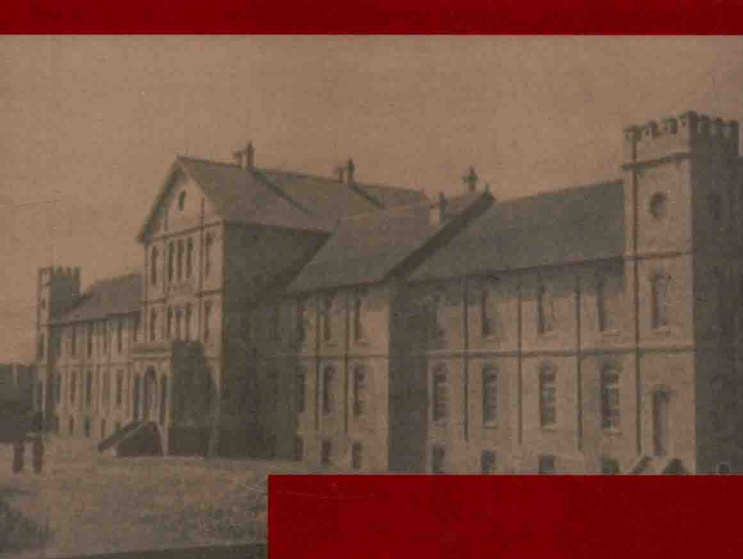


Canadian nurses at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1888-1947

Healing Henan

行醫河南

华北使团加拿大护士在1888-1947

主译 张新中 王玉安
审校 翁孝刚 吴娜
原著 加拿大 Sonya Grypma



河南人民出版社

行医河南

华北使团加拿大护士在 1888—1947

原著加拿大 Sonya Grypma

主译 张新中 王玉安

审校 翁孝刚 吴 娜

注：原著《HEALING HENAN, Canadian Nurses at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1888-1947》由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院资助，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加拿大温哥华）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医河南：华北使团加拿大护士在 1888~1947 /
(加) 盖艾帕玛 (Grypma, S.) 著；张新中等译.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215-09612-7

I. ①行… II. ①盖… ②张… III. ①护士—生平事迹—
加拿大—1888~1947 ②护理学—医学史—史料—河南省—
1888~1947 IV. ①K837.116.2 ②R4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880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承印单位：郑州印之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33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序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他们最初以传教为主,后来又逐步开办医院行医治病,创建学校并开启西方教育模式,以更有效地配合其传教及传播相关文化。随着一批批西方教会医生和教会护士进入中国开办西医诊所,现代医院在中国才逐渐建立起来。如果说教会医生进入中国开办西医诊所,将西医引进了中国,那么教会护士的到来则把现代护理带入中国,才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院在中国建立起来。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涉足的地方。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有传教士在这里开办西医诊所,且主要分布在当时河南北部(豫北)的三个政治文化中心:卫辉府、怀庆府和彰德府。本书以清朝末年、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社会变革为背景,较为详实地介绍了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华北使团的传教士们在当时中国各地、特别是豫北地区的生活及工作状况,再现了豫北地区几家医院的建立并逐渐发展壮大又历经挫折的过程,其中重点介绍了加拿大教会护士在中国开展临床护理,并创办护士学校从事护理人员培养的情况。

索尼娅·盖艾帕玛是加拿大从事护理历史研究的博士。为了再现那段历史,她历经数年,查阅大量的教会档案、资料和传教士回忆录;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搜寻珍贵的家书和老照片;并多次来中国实地考察,经过她的不懈努力终于让那些尘封已久、远去而又模糊的身影重新活跃在我们的眼前,也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艰难的岁月,走进那古老而庄重的医学殿堂。

本书按时间顺序,共分为清教主义1880年—1900年、梦想中断1901年—1920年、现代护理最终得以实现1921年—1927年、金色岁

月 1928 年—1937 年、梦想破灭 1937 年—1940 年、战争年代 1941 年—1945 年和最后时光 1946 年—1947 年等七个重要章节，以及引言、结论（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尾声（重返河南 2003 年）和附录等组成部分。通篇内容丰富，结构完整，资料翔实，细节生动，事件真实感人，对了解中国现代医院，特别是现代护理学的创建、发展，十分有益。

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遵循原著，但在征得原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对个别内容做了删减。由于译者的外语水平和对历史的理解程度有限，文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甚或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新中

二零一五年六月

前言

珍妮特·C·罗斯克尔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加拿大护士》杂志刊登了许多工作在中国河南省的加拿大护士的信件,她们是隶属于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女性传教士协会的一些加拿大护士,这些信件对索尼娅·盖艾帕玛的研究项目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来自华北使团的信件在当时可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激励了很多护士决定在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的旗帜下远赴中国开展工作。索尼娅博士在做其它研究时,对当年的这些《加拿大护士》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这些偶然发现的信件使她产生了一些疑问:这些护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她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在中国服务了几年?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哪些短期或长期的影响?

为了找到答案,索尼娅博士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从各个档案馆的文献里收集数据,走访那些护士的后代,寻找涉及或有助于了解那些护士所肩负的使命以及她们在华生活与工作状况的相关文献资料。她收集数据全面而细致,曾数次前往中国使团原址对在此处从事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进行访谈。显而易见的是,她赢得了那些教会护士后代的信任,其中也包括一些传教士子女。他们把从祖辈那里获得的信息向索尼娅博士进行了详述,并将手头所掌握的与那些护士职业工作有关的文献与索尼娅博士进行了分享。索尼娅博士每次前往中国探访使团原址、采集资料、访谈当地居民时都会随身带着其中的一些文献。

加拿大传教士在华生活与工作期间,所从事护理和医疗的那段历史得以重新构架,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索尼娅博士能够使

现在的河南,尤其是在卫辉和安阳工作的护士和医生能够理解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由于出现了社会变革,大多数文献记录遭到损坏,因而当地的医护人员对多年前该地开展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了解不深。索尼娅博士从业后不久,就在加拿大与安阳之间建立起了护理和医疗方面的交流,安阳最初的几所医院中有一所为加拿大人所建。卫辉医院建院 110 周年举行了庆典仪式并同时在医院原址建起了一所院史馆,索尼娅博士应邀出席,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该书的巨大贡献。她的照片和历史文献图片出现在院史馆并成为重要的陈列品。在庆典仪式上,她的身边还有 11 位加拿大传教士的亲属出现,那些传教士在华辛勤工作了 60 个年头,期间一直在这家医院任职。

该书意义重大,独具匠心,它记载了加拿大护士对中国特别是河南医护体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此之前对于在华使团的研究,医生是主要对象,而护士所开展的工作少有研究,仅有两篇论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护士身上。由于索尼娅博士与其他人员的努力,河南省豫北地区与加拿大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在当年是如此的紧密,现在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加强。

当年豫北使团中有 30 位加拿大教会护士在卫辉、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怀庆(今河南省沁阳市)三地工作,对其工作的性质及意义,索尼娅博士进行了努力探寻,能够参与其中,我本人也深感荣幸。作为索尼娅博士在亚伯达大学护理学院的同事,我对其在探寻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确性、创造性以及全身心的投入深感敬佩。该书依据的是她所做出的研究,非常适合大家进行阅读。

致 谢

每当人们问我是如何想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时,我必须得承认,我最初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在华的加拿大教会护士。在归档保存的《加拿大护士》杂志中我偶然发现了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信件,这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并吸引我在随后的几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我之前并未想到过这些传教士身上的激情会鼓舞着我穿越加拿大全境并横跨半个地球。非常荣幸,我能将这些护士的个人经历汇聚成一段完整的历史。很多人和机构显示出了极大热情并对我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得这项研究得以完成,对此我深表谢意。有很多人为此项研究付出了时间、精力和智慧,我感激万分。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亚伯达大学。珍妮特·C·罗斯克尔博士始终致力于护理历史的研究,她热爱自己的学生,能够帮助新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若不是由于她的启发,我根本想不到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波琳·保罗博士也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并在整个档案搜寻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和及时的指导。我不会忘记玛格丽特·豪伊博士对我的帮助。还有雪莉·斯廷森博士,帮我联系了许多相关人员和机构,其中包括加拿大护理史与英属哥伦比亚护士执业团体协会,正是这些人和机构提供的资料构成了我研究的核心。

据我所知,书中所谈及的护士已与我们阴阳两隔。她们的家人和朋友十分乐意与我共同回忆其先辈的事迹,并将个人珍藏的信件与照片提供与我,对此我深表敬意。很多人看到我在《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观察家》上发布的广告后就同我进行联系,他们的情谊令我感动。其中一些(包括巴伯·帕特南与玛丽琳·哈里森)帮助我找到了可以采访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些人亲自参与进来。受我邀请参与该研究的人员热情奉献,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已故

的护士们又重现在我们面前。穆里尔·盖伊和艾琳·普利精心收集了其姑母玛格丽特·盖伊的大量资料。玛丽(斯特拉瑟斯)·麦金博士也付出大量精力并提供了很多资料。E·B·斯特拉瑟斯医生和R·戈登医生是她与其堂弟伊泽贝尔(斯特拉瑟斯)·斯塔的长辈,保存有一些有关豫北使团所开办医院的资料和珍贵照片,去世后留给了他们,他们也无私地加以提供。麦金博士还就如何编撰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必须说明的是,麦金博士的童年在中国度过,但却并未听到过“传教士子女(miskid)”这样的称呼。我是从马里恩·孟西斯·修米尔所著之《传教士子女(miskid)回忆录》中借用的该词用以代替“传教士的子女(children of missionaries)”这一略显繁杂但却充满敬意的短语。道格·斯金纳与沃德·斯金纳在母亲珍妮·斯金纳的带领下,将婶祖母克莱拉·普雷斯頓的私人信函和照片加以整理和复印。贝蒂·比提和朱迪·普雷斯頓将普雷斯頓·罗布自行出版的有关其姑母克莱拉的书籍借给我阅读,后来普雷斯頓在去世前又赠送一本与我。在寻找曾经在河南工作过的传教士的回忆录方面,伊丽莎白·米特勒、鲍勃和贝丝·奎内尔、迈克·霍耶以及南希·沃金给予了很大帮助。安妮J·戴维斯博士将其保存的1926年中华护理协会史交给了我。路易斯·麦克莱恩帮助我从更深意义上了解了其姐姐弗洛伦斯·麦肯齐氏·利德尔的一生。霍华德·帕金森和道格·布莱登牧师提供了有关珍妮特·布莱登的资料。亚洲探险和考察旅行社的岳池(音译)帮助我和考萝·布劳迪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亚瑟·肯尼迪、戴夫·谢泼德、弗朗西斯·弗雷泽、克伦·詹姆斯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考萝·布劳迪。已退休的传教士如莉莲·泰勒、彼得·纳尔逊、多丽丝·韦勒、黑兹尔·佩奇、海伦·卑尔根(已故)、达芙妮·罗杰斯以及维尔夫·卡明斯医生(已故)向我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 and 日本的传教经历。李向东(音译)女士与任继娟女士也从中国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李慧慧(音译)博士与金珠(音译)女士帮助译成了英文。还有两位没能留下名字的人士向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也同样深表感谢。

特别要感谢玛格丽特(盖尔)·怀特曼,她将其父母戈弗雷医生与伊丽莎白·汤姆森·盖尔大量的个人资料、照片以及家庭电影与我一

同分享,还帮助我同伊丽莎白的妹妹穆里尔建立起了联系。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允许我这样一个过去并不认识的人随她一起前往中国,那是她自 1945 年离开日本人的战俘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很多档案室的管理员和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特别要感谢下列人员: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维多利亚大学档案室)的苏珊娜·克拉克和南希·罗莎;温哥华总医院档案室的格伦尼斯·齐尔姆和埃塞尔·沃宾耐克博士;温尼伯总医院女校友档案室的安妮·克罗辛;彭布鲁克的格雷神灵感孕修女院的丽塔·麦奎尔;威灵顿郡档案室的伊利西亚·德劳伦蒂斯;海外宣教使团(前身为中国内陆使团)的罗斯·卡尔顿;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格丽塔·卡明;以及麦克马斯特神学院的马克·施泰纳赫博士和理查德·杰克森。非常感谢卡尔加里大学的戴维·赖特博士与莱斯布里奇大学的卢克·蒋博士,两位亚洲历史学家通过独立的研究指导教会我很多知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珍妮·威尔逊不断地对我加以鼓励,阿尔文·奥斯汀与格伦尼斯·齐尔姆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珍妮特·比顿博士,她对于中国华西使团加拿大护士的渊博知识对我有很大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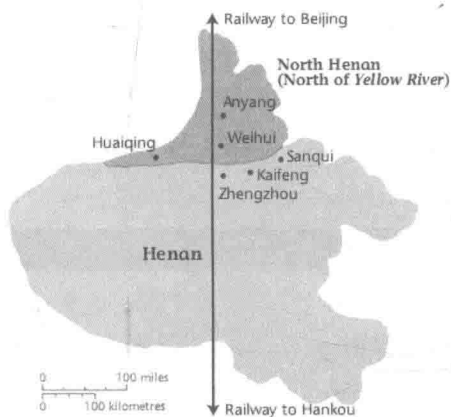
很多组织和机构通过奖学金、津贴、奖励等不同方式对该研究加以支持。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院和艾萨克·沃尔顿·基拉姆纪念奖励基金委员会分别为我提供了奖学金。我还从以下机构获得了奖学金或奖励:加拿大护理史学会的玛格丽特·阿利芒奖学金;美国护理史学会的学生研究奖;亚伯达注册护士教育基金协会的海伦·赛宾奖,亚伯达大学护理学院的雪莉·斯汀森护理史奖和伊泽贝尔·西科德奖;亚伯达大学研究生院的亚伯达省研究生奖学金和沃尔特 H·约翰逊研究生奖学金。研究所需的旅行与会议费用由国际护士社团的木西格玛部赞助,该机构为亚伯达大学设立有一个 J. 戈丁·卡普兰奖,医疗服务协会也通过学生旅行赞助对我进行了支持。

该书出版之前,受安阳和卫辉两家医院院长宋献忠博士与张新中博士之邀,我请另外十八位加拿大人和我一同到河南进行了走访,这两家医院的前身就是豫北使团所开办的医院。其中八位作为与安阳(安阳与亚伯达省莱斯布里奇市已结为友好城市)进行的护理或医学

交流人员前往,其他十一位是该书中讲述的加拿大传教士的亲属(其中有四位是“传教士子女”,此行属于重返出生地)。我们成为卫辉医院成立 110 周年庆典仪式上尊贵的客人,这也是自 1947 年豫北使团解体之后在河南出现的加拿大人与中国人的首次有规模的团聚。庆典仪式包括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开放剪彩,院史馆就位于原卫辉医院和护士培训学校的原建筑物内。这次旅行经历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重大,令人感动,但已是物去人非!

这么多年我的家人不断鼓励着我并给予我实际的支持。我要祝福我的父母亨克和科比·维瑟,感谢你们对该研究的密切关注,不厌其烦地参与我的餐后讨论,当我外出时过来帮我打理家务。感谢我的弟弟迈克·维瑟,在影像方面凭借出色的专业知识为我提出了宝贵建议。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迈克和简萨,不断地告诉我要注意休息、拥抱、做游戏和看电影。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马丁·葛兰马博士,感谢你不断地鼓励着我,在繁忙的日子里接管了家务,两次陪我前往中国并为我拍下大量的照片。

索尼娅·盖艾帕玛



Map of China and Henan province
Cartographer: Eric Leinberger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清洁主义(1880—1900)	26
第二章 梦想中断(1901—1920)	50
第三章 现代护理最终得以实现(1921—1927)	72
第四章 金色岁月(1928—1937)	104
第五章 梦想破灭(1937—1940)	136
第六章 战争年代(1941—1945)	163
第七章 最后时光(1946—1947)	190
结论: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218
尾声:重返河南,2003	230

附录

1. 华北使团(NCM)的教会护士	236
2. 由于结婚而辞职的女性传教士协会(WMS)护士	238
3. 三种类型的教会护士	239
4. 教会护士的教育背景	239
注解	242
参考文献	292

引言

相对于引入现代医学而言,基督徒(在中国)创建护理这门专业是一项更伟大的成就;尽管医学类院校……或早或晚在中国总会出现,但若没有西方女性基督徒所树立的榜样,年轻的(中国)女性不大可能去从事护士工作。

——作者名讳不详,引自玛格丽特·布朗之《华北使团史》

在多伦多布卢尔街教堂,礼拜方式特色鲜明,既庄重又正规。比如,据报道,迎宾会身着大礼服和条纹裤,领着那些前来做礼拜的信徒穿过通道,坐到编有号码的长凳上¹。在1923年6月17日,教会举行了一次对传教士的特别任命仪式,激起了信徒们的热情与好奇。在那个星期天,这座能容纳1170人的圣殿激情澎湃,基督徒们聚在一起庆祝最新一组传教士的成立,其中有四人将前往位于中国河南的基督教长老会华北使团²。华北使团是加拿大人于1888年建立起的第一批海外传教使团之一³,到了1923年,它已发展良好,拥有卫辉、安阳和怀庆三个教区,外加许多小型的乡村教点。布卢尔街教堂一直都注重传教使团的派遣,仅仅在教会官方启动传教使团派遣工作两个月后,即在1887年元月,布卢尔教堂就组建了它第一支附属的海外女性传教士协会(为基督教长老会海外女性传教士协会[WFMS]的一个分支)。1895年该教堂将詹姆斯·孟西斯医生派遣至河南,这标志着它成为加拿大最早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长老会教堂之一。教堂每月资助1200美元支持孟西斯在怀庆进行工作,后又募集了额外资金在那里建起一座小型医院⁴。1920年孟西斯遇害,这就使得教堂决定再派出四名传教士。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悲剧,那么这些传教士中有三个即一名内科医生与两名护士,就根本没有可能前往中国。

1920年,詹姆斯·孟西斯医生在怀庆加拿大使团大院被盗匪杀害,而此时,他的妻子达维娜却远在多伦多,治疗一种她在中国感染上的热带疾病“口炎性腹泻”,同时抚养教育孟西斯的女儿们。在丈夫逝世后第三年,寡居的达维娜·孟西斯夫人坚持以传教士的身份再返河南(与詹姆斯·孟西斯结婚之前,她曾在1896年作为女性传教士协会[WMS]的一名传教士到过河南)。与孟西斯夫人同行的还有年轻的内科医生罗伯特·麦克卢尔。孟西斯夫人受聘去接替她丈夫在怀庆医院的工作,并且负责监督建设一座孟西斯纪念医院。“鲍勃”麦克卢尔出生于中国,其父是威廉·麦克卢尔(中文名:罗维灵,译者注)(原来的河南七贤之一),由于一直想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他把接替孟西斯医生在中国工作的这次机会看成是一次“难得的冒险机遇”⁵。孟西斯的长女琼将会和孟西斯夫人、麦克卢尔医生一同前往河南,她不久前刚从多伦多总医院护士培训学校毕业(后来该校更名为多伦多总医院护理学校)。琼·孟西斯决定以教会护士身份回到河南,真是勇气可嘉,令人钦佩。她的这一决定非同寻常:琼不仅要在以其父亲命名的新医院工作,生活在父亲被害身亡的阴影之下,而且与她朝夕相处,照顾她日常生活的珍妮特·布赖登女士,就是琼的父亲在被枪杀的那个夜晚从盗匪手中解救出来的那名护士。不过,琼·孟西斯却得到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她母亲和“鲍勃”麦克卢尔,琼曾在小学时期寄住在鲍勃·麦克卢尔在卫辉的家中。同时,她也得到了护理学校的朋友考萝·梅·布劳迪女士的支持,而考萝本人前往中国的决定如果不是受到了琼的启发,至少也得到了琼的鼓励⁶。

1923年为庆祝鲍勃·麦克卢尔医生接受任命所举行的仪式成为布卢尔街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们至今仍对此记忆犹新。麦克卢尔性格超凡脱俗,诙谐幽默,不仅具有医学天赋,而且孜孜不倦地探寻传播基督教的新途径。在中国工作25年后,他在基督教联合教会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尽管在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大部分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关于琼·孟西斯和考萝·布劳迪(以及其他的教会护士们)的记载或注释,但是布卢尔街联合会教堂前廊的窗户却映射着她们的身影。1923年6月17日,当孟西斯和布劳迪站在布卢尔街圣坛的台阶上宣读职业誓词时意味着,河南的医疗护理即将迎来巨大的改变。在河南卫辉建起第一所

现代医院和护士培训学校之后不久,琼·孟西斯和考萝·布劳迪抵达中国,加入到加拿大护士团队中,这个团队的成员共同努力,发展并形成了一种护理实践的典范模式,这种模式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加以改进,目前在河南仍在沿用。玛格丽特·布朗指出教会护士所完成的工作“同引入现代医学相比,是一项更伟大的成就”,这也说出了许多教会护士的心声:如果没有现代护理,中国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着缺陷。

加拿大教会护士帮助改变了中国河南省的医疗卫生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也在转变。本书以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剧变为背景,讨论了职业护理同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宗教信仰、性别、文化、医疗卫生和民族观念。从抵抗外族侵略的运动开始,历经民族革命、军阀统治、日本侵略至国共内战,护理事业从个人之间、专业人员之间以及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得以发展壮大。教会护理的特点是:传经布道与护理工作间存在矛盾,非常注重洁净(清洁主义),中国护理的发展与加拿大护理的发展之间彼此密切相关,护士要适应中国,中国要接受护士。华北使团、基督教联合会、国家护士协会、中国政府,这些机构之中的社会政治力量都影响着护士对于人类遭受痛苦时的反应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团无意中成为了一个“隐居”的团体,围建起具有一定社会含义的高墙,构成了一个保护空间,在其中,加拿大护士和中国护士形成了独特而进步的医疗卫生文化。

现代护理和中国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将着重说明教会护理运动是如何影响中国一个地区护理工作的发展的——但首先我想说明一点:教会护士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护理”。也就是说,如果护理被定义为一种照料病人生理需要的正规体系,那么远在传教士来到之前,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护理体系。按照刘仲冬(音译)所说,中国的护理工作可以分为:由家庭女性成员提供的看顾(遵循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由行医者提供的中医治疗;由男性随员提供的有偿护理(这些人的身份是仆人)⁷。传教士真正带给中国的只是一种特别而新颖的护理模式,它源于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团体,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对其加以改进,并由于在

克里米亚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对英国士兵的护理而得到普及⁸。这种专业的护理体系——也称作现代的、西方的或者科学的护理——成为加拿大以及全世界护理实践的标准。换言之,教会护士是将“现代”护理带到了中国。

19世纪80年代西方传教士护士开始前往中国,此时南丁格尔的护理培训方法正处于普及推广的鼎盛时期,加拿大也开始在新开办的附属医院的护理学校对类似的方法加以尝试。例如,多伦多总医院护士培训学校,建立于1881年,到1894年已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护理学校⁹。南丁格尔推出的护理体系,强调环境方面的清洁、轻松、明亮、安静和有序,认为这样能够促进病人的自然恢复。在抗生素问世之前,清洁卫生在防止感染性疾病和促进康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最初南丁格尔并不接受微生物理论,但她对卫生状况的高度重视,对防止传染、并因此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却发挥了巨大作用。从19世纪起,南丁格尔的护理体系开始主导西方的护理领域,依照该体系,护理工作应以军事化的方式进行:必须服从医生的指令,及时进行治疗,观察病人的情况,并认真记录在案。护士的培训在医院进行,培训期间学生通过不同等级的学徒身份来提升自己。医院员工大多为护理学生,可得到一些工资收入。尽管南丁格尔的体系是非宗教的,但她在宗教团体中所学到的护理知识却对她影响深远。与其他地方一样,在加拿大,护理学生(皆为单身女性)住在一起,被寄予厚望以培养成纯洁的代表,她们外表打扮得体,身着统一制服,举止谦恭,品行端庄,恪守贞洁,绝不酗酒。护理培训与实践也融入了基督教的理念与仪式,这包括按时祈祷和学习圣经。由于其价值观与具有宗教信仰的女性的价值观相一致,对青年女子而言,护理就成为了一种高尚的职业¹⁰。

在19世纪晚期,在那些热衷于传教工作的女性看来,护士培训的实用技能对于传教使团也同样重要,护士可以担任医生的助手为患病的传教士及其家人提供医护。当教会医疗逐步正规化并集中在医院开展时,教会护理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加拿大护理事业的组织化越来越强,拥有规范的教育与职业准则,符合国家与国际护理的标准,教会护理也同样如此。到了20世纪初期,在加拿大,护理同医院的联系越